

讀姜義華「激進與保守」書後

• 孫國棟

《二十一世紀》第十期有姜義華先生的〈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一文。同期余英時先生亦有〈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一文答辯。兩文都非常結實。但因兩人所討論的範疇不同：余先生最初的講詞只論文化，而姜先生則論社會，所以不免鑿枘。對於姜先生的文章，我有幾點小意見，謹提出以就正於姜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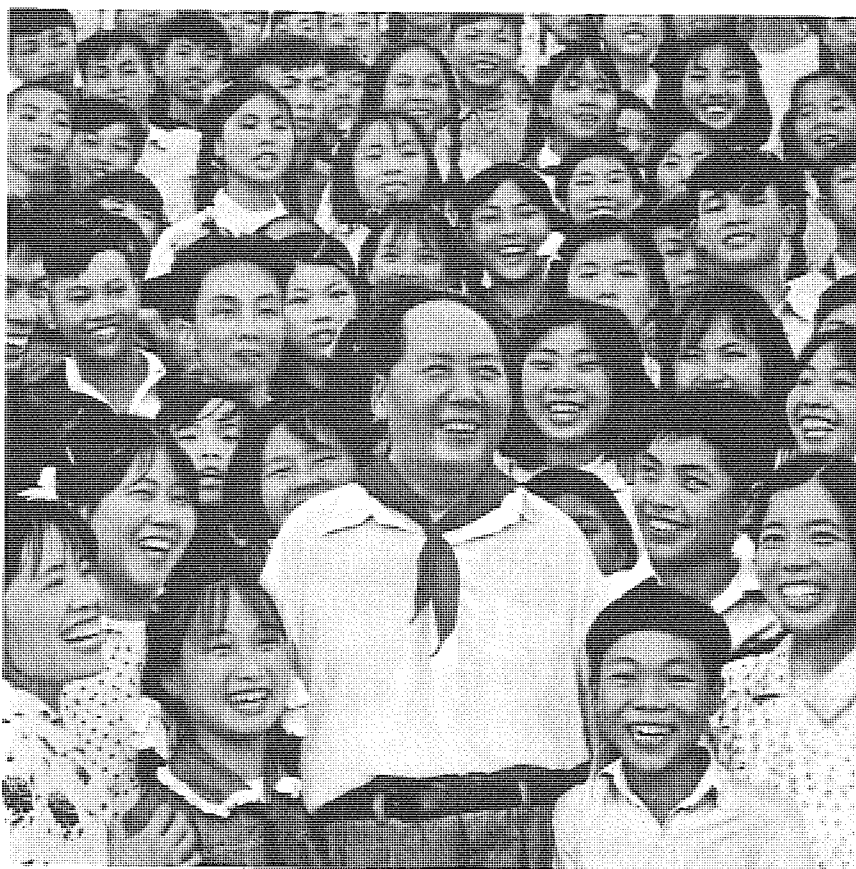
「保守」概念的周延性

姜先生認為余先生對「保守」二字涵義不確切。於是姜先生綜合英國保守主義大師柏克及保守黨政論家塞西爾的論點，界定保守主義的涵義為：保守並非不變，如果變革範圍「仍是尊重傳統、尊重權威、尊重民族主義」則仍屬於保守。姜先生據英國學者的觀點界定「保守」的涵義，不理會民族、地域、時代、事象之不同而排

斥其他解釋，顯然是不周延的。即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共和黨以奉行保守主義聞名於世。共和黨相信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是美國富強的原動力，於是守此原則主張經濟自由；為了保障經濟自由，故必尊重個人的自由及信賴個人的責任感。所以極力反權威，亦與民族主義無涉。可見保守的涵義，不必教條化地依從某一說。姜先生把英國一政黨一時的觀念教條化、普遍化，進而認為凡從事於有關中國學術的學者、或對中國民族文化稍存尊重之心的學者，不問他們的學術觀點如何、理論如何、時代如何、內容如何、門類如何、範圍如何、角度如何、對改革的態度如何，甚至連治甲骨學、金石學、聲韻學、敦煌學、史學、地志學、白話文學、古詩學、詞學、曲學、戲劇、小說等與激進保守無關的純學術一律等同於頑固的保守派，視為對改革的阻力。這觀點大有問題。

把英國一政黨一時的觀念教條化、普遍化，進而認為凡從事於有關中國學術的學者、或對中國民族文化稍存尊重之心的學者，一律等同於頑固的保守派，視為對改革的阻力。這觀點大有問題。

中國傳統的尊君思想，與權力的制度化關係密切，跟現代中國狂熱的領袖崇拜根本不同。



尊君觀念與領袖崇拜之異

關於對文化大革命的判斷，余先生認為是中國近代激進主義的高峰。而姜先生說：這只是看到表面現象，而「未深入考察文化大革命所維護和堅持的究竟是甚麼」，更認為那種「圖騰化、宗教化的個人崇拜正深深地扎根於中國的傳統」。於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歸咎於中國文化傳統的保守思想。關於這問題，余先生已有辯正，我本不必再提出。但目前有些學者與姜先生相似，喜歡把對領袖的狂熱崇拜歸罪於中國以前的尊君思想。這是由於未能辨別「尊君」與對領袖狂熱崇拜兩種觀念不同的根柢所致。尊君思想乃由於對制度的忠誠；而狂熱的崇拜領袖乃由於對領袖個人的神化。如果我們讀上古史，不難發現當各部族由部落發展成為國家時，在政

尊君思想乃由於對制度的忠誠；而狂熱的崇拜領袖乃由於對領袖個人的神化。

治上的最大特徵是由領袖的武力統治轉化為透過制度的權力統治。權力統治必須依賴制度，而確保制度的效能，則須憑藉觀念的力量。所以凡在「君主制」之下，必然強化「尊君」觀念。故君主之被尊崇，不是由於君主的英明神武或天才卓絕，而是由於他處於「君位」之故。所以中國歷代不少幼君、庸君，當其處於君位之時，臣民必尊尊重重。而英主雄主，未必不受批評。故雄略如漢武帝，夏侯勝斥其「奢侈無度，以天天虛耗，百姓流離，無德澤於民。」英明如唐太宗，被魏徵諫諍二百餘事。對幼君庸君加以尊重，而對雄主英主加以批評，這正表現一種制度精神，故尊君一觀念，乃出於對制度的虔誠，非圖騰化的個人崇拜。中國自1949年以來，對領袖的狂熱崇拜，決非胎息於尊君思想，而是導源於列寧、史太林的天才論。

煽動群眾情緒而形成的造神運動，文化大革命要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它以破舊立新為主導精神，如何可以指為扎根於中國文化傳統？

激進思想的底線

關於激進思想的底線問題。余先生認為幾十年來的變革一個比一個激進，似乎沒有底線。姜先生卻指出幾十年來的變革有三個目標(底線)：

(1) 是「以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現代經濟取代長期停滯在落後狀態的古代經濟……以現代商品市場經濟取代傳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全國性及世界性廣泛而直接的聯繫而取代先前狹隘封閉的地域性及政治強制性的聯繫，從而逐步實現社會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世界化。」

(2) 是「變以忠孝為中心的社會價值體系為確認個人自主、自立、自由的價值體系；變以尊經明道強化禮教的社會知識與教化體系為以崇尚和發展科學、保障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知識與教化體系……」

(3) 「使社會大變革的成果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共享，防止像西方許多國家……出現新的兩極分化和激烈的階級對抗。」

第一個目標就不能使人無疑。自1949年以來，中共一直執行政治強制性的經濟政策，直到最近，逼於內外形勢然後開始試走經濟的開放路線，初步試行市場經濟。這樣能夠說幾十年的激進主義對經濟具有市場化、城市化、世界化的預設目標嗎？

第二個目標更不能使人同意。因

為中共一直蔑視知識分子，到目前仍反對自由思想，不願提人權觀念，能夠說幾十年的激進主義是以確認個人自主、自立、自由的價值體系為目標嗎？能夠說是以保障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知識與教化為目標嗎？

第三個目標是社會主義所揭櫫的理想，亦是所有共產政權所標榜的目標。但是經幾十年的激進改革結果，一個如吉拉斯所描寫的「新階級」出現，實使人懷疑幾十年的激烈變革是否真正懷抱此理想。

所以姜先生所標舉的三個目標，只是姜先生個人今日的構想而已，非激進主義者當時的實情。激進主義者情緒的激動常掩蓋了理性。

小 結

姜先生最後指出中國近百年來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經常各趨極端化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缺乏一支足夠強大、足夠成熟的中堅力量作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以推動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良性的互動」。這點觀察，非常有見地。但是，我必須指出：社會的中堅力量，最重要的成員是知識分子與中產階層。很不幸，自從1949年以來，知識分子及中產階層正是最受壓迫與摧殘的一群。這是幾十年來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亦是革新所以未能成功的原因所在！

孫國棟 前新亞書院文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自1949年以來，對領袖的狂熱崇拜，決非胎息於尊君思想，而是導源於列寧、史太林的天才論。